

三曹与中国诗史

孙明君 /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三曹与中国诗史

孙明君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曹与中国诗史/孙明君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142 - 8

I. ①三… II. ①孙… III. ①诗歌史—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6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曹与中国诗史

孙明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42 - 8

2013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¹/₈

定价:30.00 元

序

葛晓音

5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这自然是因为17年间衡量文学价值的几把尺子如“人民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都适用于建安文学的缘故。既然是重点,评价也就定型。以至于进入80年代前期,人们对于建安文学的认识仍不免受17年观点的拘束,至80年代后期,才受当时思潮的影响,逐渐解放。这一变化,明君在绪论中用“现实说”和“觉醒说”加以概括,是很简明切当的。其实又何止于建安文学,整个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趋势莫不如此。

文学研究既是学术,总不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中国学界与文化界一样,又是很容易形成潮流的。有了潮流,便有了赶潮流的人群。能冷静观看潮流的人倒反而显得落寞寡合。但这样的人却往往能自立其说,另开境界。明君在理智地分析了“现实说”和“觉醒说”的长处和不足以后,榷其中论,力求客观地对建安文学的全貌和本质做出准确的分析,这既要有学者独到的见识,也要有敦诚君子的品格。

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是在系统地研究了50年代以来、

特别是新时期所有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著之后写成的。至少在我所见的有关这段文学史的论著中,还从未有人如此认真地分析过前辈时贤的得失,并把各种论点归纳总结,使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充分掌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这本书的绪论和附录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使人一编在手,便对四十多年来建安文学研究的概况一目了然;其次是中间三大篇的各个专题都能在广泛征引和检讨已有论点的同时突显出自己的见解。通过析论和驳论展开自己的论述,并精确地引出他人论点的出处,这本来是学者应当遵守的规范,也是起码的道德。然而近些年来,能够恪守学术规范的人不多了;而不客气地照搬并“熔铸”他人成果的皇皇巨著却日见增加。对照之下,明君的诚实,尤其难能可贵。本书的构架也正是出自这种老实的态度,“不求面面俱到,只选择了若干自己有感想、有新见的问题分别展开论述。这样,本书合之虽为专著,分之则为论文集”,“每一章即为一篇首尾完整的独立论文”(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绪论”)。这种写作形式不能像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新编文学史和诗史那样,大块地“包容”他人成果,必须实实在在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文字不多,部头不大,但两相比较,价值孰高孰低,明眼人一望便知。

明君在考察了建安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选择“三曹与中国诗史”这一题目,“旨在从中国诗史的流变中把握建安时代三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性与革新性,进而对三曹及建安诗歌在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同上)。这一角度的选择是对建安文学研究现状的突破,也有相当

大的难度。目前已有的建安文学专著一般都是按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法,分时代背景、作家思想、诗、赋、文、文学理论几个部分梳理归纳。这种框架并非不能出新,但缺乏一种宏观把握的魄力,不易更新视角,使研究向纵深发展。本书内篇三章,提出中国诗史三源一流说。认为三曹恰处于三源一流的关捩期,并以此确定他们在题材、气象、诗体、人格等方面开辟中国诗史之流的贡献。外篇六章主要分为曹操对原始儒学的诗化、曹丕诗歌中的生命意识、曹植诗歌中的人格建构三方面,也都是抓住三曹对中国诗史最重要的影响立论。这样,虽然各章独自成篇,却又自有内在联系,使外篇与内篇形成分论与总论的关系,较完整地体现了全书的基本构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当然,判断一本专著学术价值的高低,最基本的标准还是看它解决问题的多少,有无作者的独见和创获。古典文学研究与美学、文艺理论等学科的不同,在于理论研究者可以用史学研究的成果构筑资料基础,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为论据,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文学史研究应当是以原始资料为论证依据,切实地解决一些史学上的问题。但凡以同行研究成果为资料依据、构筑理论框架的论著,不是失于架空,便是缺乏新意,原因就在于这种宏观概括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微观研究作基础,往往从论点到论据都是一些已知的常识或他人的成说。因而文学史研究必须求实,切忌虚浮。本书的主要长处是能够以实证为依据,对建安文学研究中许多流行的概念和观点进行追根溯源的清理和辨析,进而对这些概念和观点是否适用于评价建安文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内篇第一章在梳理了先秦两汉的“诗言

志”说之后,指出真正将原始儒学“诗言志”的理想落实到创作中的是曹操。第三章详细考察了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的由来,指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最早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谨慎地分析了鲁迅征引铃木之说的本意,以及这种观点在学界流行的情况。继而又在检讨“觉醒说”的各种观点之后,提出建安时代“人的觉醒”包含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两个层面;“文的自觉”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不表现为与儒家传统文学观念决裂。外篇第四章不赞成以往认为曹操逆违儒家思想的一般看法,通过分析汉末形势及曹操的政治策略、法治思想和原始儒学的人才观,有力地论证了曹操的主导思想表现为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回归的观点。第七章据《艺文类聚》卷56所录《典论·论文》、王粲归附曹魏的时间、阮瑀的卒年等史料,论证此文作于建安十六年,推翻了流行的“黄初初年”说和“太子时期”说。又通过对《典论·论文》内容的全面分析,指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均为先秦两汉儒家成说,不是“文的自觉”的号角。文章只是为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习,劝告文人安心于翰墨工作。作者的见解或者可容商榷,但其论证则都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订,不仅仅是为成说翻案。此外,第八章分析曹植的人格特征的前后变化,将关于曹植行为的史籍记载、曹植在诗文中的自我表白联系起来,探索其建立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的意义;第九章对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予以辨析,中肯地分析了这种理论被汉儒歪曲的原因,指出诗史上“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由曹植首次在创作上完成;也都颇有新意。“温柔敦厚说”在古代被抬高,在当代被贬斥,向来缺少公允的评

价。这里的分析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贯串于全书,也是作者多有创获的重要原因。

明君多年来师从霍松林先生。199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随陈贻焮先生继续研究,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博士后。其为人忠厚谦和,文风也老实严谨。常言道“文如其人”,虽不尽然,对于明君却是适用的。做学问最要紧的是老老实实、谦虚谨慎的态度。明君以此见长,又能勤奋耕耘,必然会有丰厚扎实的收获。他在博士论文《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出版之后不到四年,又有这部新著问世,便是学业有成的明证。今明君嘱我作序,遂拉杂写下这些感想,希望与明君共勉,也借此表示祝贺之意。

1998年7月于日本东京大学

目 录

绪论·····	1
---------	---

内 篇

第一章 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15
第二章 建安气象·····	88
第三章 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	108

外 篇

第四章 曹操的主导思想·····	131
第五章 曹操对原始儒学的诗化·····	143
第六章 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	165
第七章 《典论·论文》甄微·····	180
第八章 对曹植人格建构的动态考察·····	196
第九章 曹植诗歌的情感特征·····	221

杂 篇

第十章 原始儒学的真谛与歧变·····	257
第十一章 庄子哲学中的三重人格境界 ·····	273
第十二章《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 ·····	288
附录一 45 年(1949—1994)来三曹研究综述 ·····	302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40
后记·····	343
再版后记·····	345

绪 论

一 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建安文学，千载而下，令文人骚客欣羨不已。他们或考订，或整理，或写序题词，或阐释微言大义，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珍贵遗产。1949年以来大陆学者沿着刘师培、鲁迅等先生所开创的新路向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方法的优化，建安文学研究呈现出新气象。其主要表现是：（一）在诗文整理方面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夏传才先生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先生的《曹丕集校注》，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郁贤皓、张采民先生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另外，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和河北师院中文系编辑的《三曹资料汇编》的问世，为我们了解三曹生平事迹与创作背景、检索古人研究状况提供了莫大方便。（二）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除张可礼先生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先生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先生的《曹植新探》等专著之外，许多分体断代文学史著作，都对建安文学做了析论，如葛晓音先

生的《八代诗史》、王钟陵先生的《中国中古诗歌史》、钱志熙先生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程章灿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赋史》等。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建安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尤丰,其中既有造诣精深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亦有意气风发、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人。(三)新时期以来已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的建安文学研讨会:1983年5月在安徽亳州、1988年11月在河南许昌、1991年4月在河北邯郸分别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1993年5月在安徽亳州召开了全国首届三曹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召开推进了建安文学研究的进程,提高了建安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显然,进入新时期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走上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或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的研究;二是关于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三是关于三曹的研究;四是关于建安七子与其他诗人的研究;五是关于建安文人集团的研究。以下就此五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与简要的评说。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是研究者首先触及的问题之一。在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多数学者将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等同于“建安风骨”,并对“建安风骨”这一古典文艺理论范畴赋予了新的解释。流行的观点是,所谓“建安风骨”即是指建安诗人在他们的创作中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疾苦,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特征。此论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时却忽略和回避了建安诗作中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

宴”的内容。

进入新时期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表现之一是对“建安风骨”的理解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不是对建安文学总体特征的概括,不是指充实刚健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不能包容建安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因而不宜用“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表现之二是更多的学者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认为包括建安在内的魏晋时期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李泽厚语),“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最值得注目的一点,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章培恒《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载《复旦学报》1987年1期)此后,许多论者对李、章二先生的论断做了引申发挥。如果我们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说法称之为“现实说”,那么近年来盛行的观点则可称之为“觉醒说”。“觉醒说”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而诞生,一反成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较之于“现实说”,“觉醒说”重视到了长期忽略的问题,凸现了许多被忽略、被曲解的问题,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但是,“觉醒说”同样不能包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显然“觉醒说”是就整个魏晋文学的共性而言的,相对忽略了建安文学的个性。从建安诗人的创作情况看,功业思想与英雄意识是

他们思想的主导,他们的创作中的确大量存在着关心民瘼、抒写壮志之作,这是不能忽视、淡化的客观事实。同时个别论者全盘肯定了魏晋时代“人的觉醒”之思潮,也是值得商榷的。将自我与社会政治完全割裂,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沉湎于生命本然的享乐之中,未必是一种“觉醒”。人的觉醒思潮所带来的,既有思想解放的真觉醒,亦有人格沦丧、道德堕落的假觉醒,不可一概而论。因之,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建安文学整体风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可区分为非文学原因与文学源流的演变两个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促使建安文学繁荣的社会政治原因的阐释,只满足于套用刘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成说。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建安文学进行分期研究,他们以曹操一统北方为界,前期的建安文学确与现实的动乱相关,但即使此时也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建安后期(邺下文坛)文学的繁荣,不但不宜用“世积乱离”来解释,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产物。不用说,文学的繁荣是多种因素的凑泊。较之于以前将建安文学繁荣的原因归结为“世积乱离”的单一解释,新时期以来不同侧面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

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建安文学乃是对以往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延展。大多数学者认为建安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是较为全面的,又是有一定侧重的。有人认为建安作家最为重视的是《诗经》中的风雅和汉乐府民歌;有人认为汉乐府对建安诗人的影响更为直接;有人指出汉赋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对五言诗的腾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人指出建安诗人从《楚辞》和《古

诗十九首》中吸取成分。凡斯种种,均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三曹研究是建安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受到了新中国文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共同关注。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以郭沫若先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应该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讨论。多数学者认为从社会政治表现方面应该肯定曹操,但也有个别学者坚持了相左的看法。十年动乱中曹操被打扮成法家路线的代表。近些年来学者们重新评价曹操,对曹操的主导思想、人才观念、军事思想、神仙意识以及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注、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与 17 年不同的是:对曹操思想的探索更为广泛深入;对曹操文学创作的研究明显加强;多数学者认为曹操诗歌体现了建安时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对一向避而不谈的游仙诗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封建时代,曹丕通常被视为篡逆的奸贼和心胸狭窄、阴险狠毒的小人。郭沫若先生认为曹丕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此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体而言,多数学者都能程度不同地重视和肯定曹丕在汉魏转换之际的历史作用。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曹丕诗歌评价偏低,认为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狭窄,艺术风格流于纤弱。近年来这种偏见已得到扭转。许多论文对曹丕诗歌的内容与艺术风格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见。与对曹丕人品和诗品的评价不同,学术界对于曹丕的文论一直较为关注,评价亦高。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位置。

近年来对曹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辨、政治能力与政

治表现、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等几个方面。对曹植生平的考辨历来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经过学者们近年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一些长期积疑的问题得以冰释,一些长期忽略的问题引起了重视。对于曹植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上世纪50年代有一场小范围的讨论,1983年徐公持先生著文回顾了那场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曹道衡、胡明等先生近年来亦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以前将曹植文艺思想视为保守退步的旧说不同,新时期以来多数学者认为以曹操逝世为界(亦有人认为应以曹丕得立太子为界)曹植的创作有明显的差异。在17年中,由于受政治中心主义的干扰,研究者只重视其具有政治性人民性的作品,近年来学者从审美的角度观照曹植全部诗歌,多有创新之见。针对曹植游仙诗的评价也展开了一定的争鸣,打破了昔日的冷寂。曹植的辞赋和散文创作也日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对《洛神赋》的研究,除“寄心君王”说和“感甄”说之外,又出现了象征说、原型说等新的提法。

一些学者从作家的思想到作品的主题类型、思想意蕴、意象意境、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色彩等不同的方面比较研究了三曹及其作品;还有一些学者将三曹与异代诗人比较研究,例如屈原与曹植、曹植与阮籍、曹植与陶渊明等。这些比较研究进一步突显了三曹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

新时期以来的三曹研究充分体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气氛,也出现了一些功底扎实、创见迭出的力作,整个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在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事实上冷落了建安七子和建安其他诗

人。新时期以来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搜集、考订及评述建安七子生平事迹的文章;其次,对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有了不同的看法。流行的观点认为孔融的政治态度与其他六子不同,他与曹操有矛盾,王粲等人则依附于曹操。与此不同,或以为七子在依附曹操前后都具有共同之处;或以为孔曹交恶是性格的冲突,或以为孔曹交恶源于政治立场的对立。王粲的态度亦比刘桢等人远为复杂,不宜笼统说王粲等六子依附于曹操政权。最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学者们析论了建安七子诗、文、赋的主题类型与艺术特征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总论七子的共同特征,或分论七子的不同特色,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见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近年来亦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对杨修、丁翼、丁仪、吴质、繁钦、应璩、甄后、左延年等建安作家亦有所论述。较之于建安七子和其他诗人在建安文坛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很不相称。

文人集团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邺下文人集团虽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集团,但它以其崭新的面貌、独特的风采而饮誉诗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邺下文人集团的人员组成、组织方式、活动内容以及对后世文人集团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或以为三曹与邺下文士之间是平等友好的新型关系,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文人之间具有诚挚的友情,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其活动方式、内容为后世文学集团做出了榜样;或以为三曹与诸子的关系是主子与文学侍臣的关系,邺下诗人的创作既有激越昂扬奋发